尤·米·洛特曼文学符号学中的区分与移位原则^{*}

[匈牙利] 卡塔林·克罗 李瑞莲 译

摘要 本文基于对移位与区分原则的分析,探究洛特曼文学符号学中的意义生成与更新机制,揭示其符号学术语体系内在的关联性与一致性。作者将移位与区分置于有序化、符号域、约定性等概念与术语的有机联系中加以综合考察,从语义、结构、语境等多重视角阐释这一问题在洛特曼文学符号学研究中的独特价值。本文认为,移位作为意义区分的一种主要符号学策略,参与文本内与文本间符号交流的动态过程,对意义的不确定性、开放性、多元性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洛特曼 文学符号学 移位 区分

DOI:10.16238/j.cnki.rla.2024.01.009

一、移位问题提出的意义

(一)

可从两个方面确定移位(транспозиция)概念研究的意义。首先,我们应当提及当代人文学科领域与符号学密切相关的重要研究方向,这些方向侧重于跨媒体、跨文化性、跨符号学与翻译符号学等重大主题的研究。上述研究领域都无法忽视移位这一符号学现象,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可将其理解为翻译、改写,以及将某些文本转写为不同媒体、体裁、话语等类型的其他文化文本的文化移位。如果将本文主题的提出限定在文学符号学领域,那么

应当指出,对文学文化中移位的作用与意义生成潜力的确定与多种阐释可作为在文化符号学语境下理解文学符号学学科描述途径的方法论标准。鉴于这一目标,在克罗·托罗普(Кроо-Торон)的文章中,移位被视为文学文本动态过程符号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矢量之一(另外两个范畴是调解与时空性)。在过程与符号学结果意义上,移位概念包含多种意义生成机制与符号意指形式。参看:

我们将在以下几个主要范畴中研究文本与文化动态的关键方面:(1)调解;

^{*}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尤里·洛特曼著作集汉译与研究”(21&ZD284)的阶段性成果。

(2) 移位;(3) 时空性。

.....

移位: 意义生成、传递偏移、语义转换、层次间动态、文本—元文本、结构—语义连接、整合、分层、作为移位的翻译、跨媒介翻译等。^{[1](160)}^①

本文试从理论上探讨移位的初始概念化问题,因为这一问题通过术语中明确或隐含地出现在尤里·洛特曼的早期学术著作中。

这一主题设定意义的第二种可能的语境化与术语问题有关。移位概念的研究,一方面,可为洛特曼的术语体系引入另一种划分逻辑,另一方面,可使这位学者全部学术创作中概念体系的一致性变得更为显著。这里指的是,如果根据洛特曼的观点选择关键概念,通过这些概念确定意义生成与“思维世界”的机制,那么就不难达成共识。我们的概念中无疑会包括符号学系统及其组成部分诸多元素不对称意义上双成份条件下的语言多元性(多语性),作为文本内与文本间符号交流条件的边界活动性,以任何文化文本或信息阐释(即创建获取意义的途径)为目的进行翻译的必然性,这一点也与文化对于自身与其他文化(在多重对话系统中)对话的兴趣与对话的能力相关——所有这些方面都以某种方式综合在符号域这一概念中。

(二)

我们在本文中关注的焦点是一个新的变异术语领域——区分(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ие)、语义结构、有序化、语境、约定性。移位主要被诠释为意义的区分,因为它表现在符号空间(符号域)中新意义生成的基础上。移位是指穿越边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洛特曼对文学文本中事件的定义,他指出:“文本中的事件是人物穿越语义场边界的位移”。^{[2](282)}事件产生的领域与范围很广。洛特曼不赞同将事件等同于对“某种事实或行动与实际的所指或自然语言语义系统之间关系”的描述。由此可见,他指的既是某种艺术元素与文本外所指之间的语义对应,又是它与自然语言语义系统中能指的对应。因此有必要在“由文化类型决定的二级结构语义场”中确立这一元素的地位。事件地位的获得还取决于“同一事件”在“同一文化图式内”的结构层次。由于“除文本的整体语义有序化”外,还存在具有各自概念边界的“局部”有序化,因此可将事件创建为“更具体层面的事件层级结构,一个事件链——情节”。^{[2](282)}

尽管洛特曼对情节进行了阐释,但显然这是从语义角度进行的阐释,即事件性被诠释为语义转移(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① 也可参看包含在调解与时空性概念中的一些现象:“调解:文化联系、关系语义学、作为调解的阐释与翻译、文化文本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对话以及文化文本中的模拟交际、调解结构等……时空性:过程性、颠覆、分离、静态/静止与动态、叙述与描述、渐变与爆炸性变化(“爆炸”)、时间与空间、时空体、中心与边缘等”。(Kroó K., Topor P. 2018. С. 160-161)

сдвиг)。^①无论如何,语义行为意义上的越界(穿越语义场)与以下事实密切相关:洛特曼在其整个学术活动过程中都肯定翻译的必要性,或在意义解释中,即在符号学交流行为中肯定对不可译性认识的必要性。在哲学意义上,移位也可以被认为是 В.Т. 法里托(В.Т. Фаритов)^[3]在与后结构主义形而上学的联系中所评价的一种越界类型,它与不确定性、自由语义开放性、多元化问题密不可分,在这个意义上也与立体性概念密切相关。^②

从纯粹结构角度来看,在洛特曼的早期作品中,我们所理解的移位意义上的迁移、位移、转置都与**结构层面的更替**有关[例如,此处指横组合关系与纵聚合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关于不同文本的层级与层面,依据洛特曼八十年代词汇学的特点来看,可以说是关于符号域与各种亚符号域空间的联系,我们可以回顾这位学者的表述:“亚符号域”^{[4](263)}(可与“子集合”^{[2](304)}相比较)]。移位发生在不同领域之间,洛特曼将其称为有序化领域(事实上,这些移位体现了意义的发展,即以旧义转变为新义的形式进行语义区分的现象)。翻译保证了这些领域之间的移位(甚至在无法完全翻译的情况下)。在《艺术文本的结构》一书中,除整体有序化外,洛特曼谈及“附加”有序化,主要是“局部”有序化问题(参见上文引文),^{[2](282)}因此在这位学者对情节现象阐释的语境中继续引用该定义时,我们应当回溯“局部有序化”这一表述:“此外,可能出现充分独立于主要有序化之外的局部有序化”。^{[2](288)}无论依据作为“结构主义者”的洛特曼,还是

^①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区分**事件性情节**和**语义情节**这两个现象与概念是合理的,也是有理论依据的。(Кроо К. «Творческое слово» Ф.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Герой, текст, интертекст[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 2005. С. 7.)对于这种区分的解释需要补充一点,正如洛特曼在上述《艺术文本的结构》(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中已指出的,纯粹形式的事件性,即以**主人公**位移的形式展开的情节中文本意义的实现,同样作为**语义**的生成发挥作用。然而,我们认为,在文学文本中,脱离作品中描述的行动背景,追踪在语义情节阐释中观察与描述的语义过程的动态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语义情节**被定义为“文学文本中某些语义生成过程的个别线索与整体,包括作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作品的**事件性情节**。单个主题的**语义情节**等同于一些意义生成过程,其发展与连贯性决定了在特定艺术语境中母题**意义演变的诗学史**”[同上,第7页;另见:同上,第227-228页。我们的定义已经作为术语被使用,并被Т. И. 佩切尔斯卡娅与Е. Л. 苏兹留科娃引用。(Печерская Т.И. Сны о пиковой даме: о «странных сближеньях» и структур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сюжета у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С] // Фортунагов Н. М. Болдинские чтения. 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 Вектор ТИС, 2007; Сузрюкова Е.Л. Событийный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сюжет в циклах рассказов В.А. Никифорова-Волгина «Детство» и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детства»[J] // Вестник ВГУ. Се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2023, № 1. С. 59.)有关理论阐述的发展以下参见: Кроо К. Нарративная и семиотическая динамика «очерка» Н. С. Лескова Леди Макбет Мценского уезда[М] // Лотман М., Кузовкина Т., Пилярчик Э. Динам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кста. Kraków: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Jagiellońskiego, 2019. С. 157-175.]

关于这一术语的含义,若追溯概念形成的过程,可参见Ю. Н. 特尼亚诺夫,他区分了“作为本事的情节”与“词层定位”的概念。(Тынянов Ю.Н.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Кино[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7. С. 60-61.)关于“语义情节”这一术语的使用,可参见Д. 谢加尔。(Сегал Д. История и поэтика у Мандельштама: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а[J/OL] //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 1993, Vol. 33, № 4. С. 386 [доступ: 05.11.2016]. <http://www.persee.fr/collection/cmr>.) (下转 135 页)

他作为符号域阐释者的概念,我们都会得到一些类似的概念化——在整体语义有序化框架内指出局部系统性(这又被称为“语义结构”,^{[2](289)}而且在符号域内,此类有序化被重新命名为亚符号域。在这两种情况下阐释符号功能,即意义产生时,指的都是边界的多重交叉与多种交叉,指迁移,即移位:

事实上,整个符号域空间被不同层次的边界、被某些语言甚至文本的边界分隔开来,而且每个亚符号域的内部空间都有某种自己的符号“自我”,体现为某种语言、一组文本、某个文本(考虑到语言与文本在不同层面上分级排列的事实)与它们描述的某种元结构空间之间的关系。诸多局部边界穿过符号域,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系统。^{[4](263)}

综上所述,从方法论上说,在阐释移位时,我们也不应将所谓的结构主义的洛特曼与后结构主义的洛特曼截然分开,因为对这一符号学现象的阐释是洛特曼整体创作与学术遗产的一个常量。同时,“有序化”一词可从符号系统性与子系统性的意义上加以诠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保证了通过彼此分开的方式将符号化领域加以区分。其次,这些领域通过越界、迁移、再现、翻译,即移位,在相互关联中成为了活跃的意义生成空间。在此意义上,“有序化”这一术语在功能上与洛特曼在《艺术文本的结构》中提及的“语境结构”(контекст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参见:“文本元素进入多个语境结构并相应

获得不同意义的这一能力是艺术文本最深层的一种属性”)^{[2](79)}与“结构语境”(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й контекст)^{[2](101)}紧密相关。这些语境阐释的观念背景为:“诸多彼此交错的子结构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其中同一元素在不同结构语境中多次出现。”^{[2](101)}有序化概念与作为语义结构的语境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引人关注。另一方面,如此理解的语境同洛特曼、乌斯宾斯基所说的约定性极为相似。符号的约定性本质上是指任何表现系统与被表现系统之间公认的对对应条件。另一方面,在《艺术文本结构短评》(Заметки о структур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上接 134 页)

② 参见立体性概念(包括从不同侧面观察物体的能力的意义)与视点概念之间的联系。一方面,立体性的产生是由于信息不完整,“只有通过信息视点的立体性才能对其加以有效补充”。相互理解的困难反映了,同时也需要综合(参见综合的概念:Лотман Ю.М. 2000. С. 585.)他人的观点,而此类综合相当于翻译:“沟通行为不同于简单传递不变的信息,而是类似于翻译”,翻译既会导致一些损失,也可以“通过承载他人观点的文本丰富‘自我’。结果,‘自我’也获得了成为自身的‘他者’的可能”(Лотман Ю.М. 2000. С. 554.)。因此,异质性会导致翻译,但只有异质性在同一框架系统内运行时才会如此。在我们看来,这当然可以体现在不同角度——能够体现在同一交际系统中,或是投射到多个交际参与者身上。“随着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个性结构的复杂化,随着构成个性意识内容的代码集变得更加个性化”,对翻译的兴趣也随之增加(Лотман Ю.М. 2000. С. 563.)。立体性创造了“获得对同一现实完全不同的映射,并将其翻译成完全不同的语言”的可能性(Лотман Ю. М. 2000. С. 579.)。交际行为的有趣之处在于,发展了“多种模式的非同—性,这些模式的形式中反映出其意识中的外部世界。当构成其意识的代码不一致时,就会产生此类情况”(同上)。

文中,洛特曼谈到了生活的变形如何在艺术中体现,这不是畸变意义上,而是在文本与对象合理同构这一意义上的变形,同时,表示对象的符号相对于该对象而言也发生了变化。^{[5](286)}此处涉及到“文本重新编码,生成另一个符号系统”,^{[5](285)}这与移位相对应。

重新编码对象(被理解为文本)的同构性与其变化(变形)彼此结合,洛特曼在强调重新编码这一结果意义上的二元性时强调说,上述变形“完全由一个众所周知的论点决定,即任何符号系统都具有约定性、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差异”。^{[5](286)}

(三)

如果对诸如“语境结构”(以及将在下文讨论的更广泛的语境)、作为语义系统的有序化、亚符号域、符号约定性等组合概念与术语加以综合阐释基础上获得的信息加以总结,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上概念与术语构成了阐明“移位”,即通过意义区分生成意义的符号学行为的统一背景。

阐明移位研究的重要性后,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移位研究使实现文学文本中意义生成与动态再现的符号学理解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成为可能,也使得洛特曼用于将上述观点概念化的一系列术语的系统性成为可能。这种连续性证明了那些强调整体学术创作(从早期作品到后期作品)具有内部连贯性的学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参见:

实际上,如果从外部观察洛特曼,就会对其后期研究产生一种激进革新的印象。然而,如果专注于洛特曼著作本身,并再次逐一回顾其研究生涯的几个主要阶段,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洛特曼(或交流者与对话者洛特曼)的新形象就未必令人信服。被视为根本性改变的那些论述很可能是一个新的焦点,是注意力的转变,有时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新方式……但无论如何,这并非洛特曼对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并穷其一生不断完善的研究原则的放弃。^{[6](217)^①}

二、作为语义事件(语义情节)的移位

让我们回到洛特曼所引用的“事件”的定义:事件是“人物穿越语义场边界的位移”。这一定义获得了一个广义的等值表述:如果将情节界定为事件的展开,那么情节便是“穿越语义边界的移动”。^{[2](288)}此处需要强调一点: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行动构成了事件,本事得以艺术呈现,即形成了事件情节,虽然情节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但如前所述,洛特曼重新阐释了情节的概念,强调了其语义功能。他将主人公的形象置于中心,主人公得以越过或是无法越过严禁潜入的空间与允许进入的空间之间的边界,这两个空间被需要克服的障碍隔开。但是这样的**情节**(它正是引人入胜的情节的具体化)或情节的缺

^①这段话在一本重要论著中也曾被引用: Салупере С. О метаязыке Юрия Лотмана: Проблемы, контекст, источники[D]. Tartu: University of Tartu Press, 2018. С. 29.

席(维护“既定秩序”与“边界稳固性,使其不受侵犯的无情”,^{[2](287)}参见:“情节的推进与事件是逾越无情结构所确认的禁止性边界”)^{[2](288)}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世界与反世界的特定语义化,而且还因为其语义负载包含着语义抽象化趋向。首先,主人公在空间中移动(这是他的情节移位)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洛特曼说:“显然事件的概念取决于文本中采用的空间结构”。^{[2](288)}“因此,情节总是可以缩聚为一个主要情节——在其空间结构中越过主要拓扑边界”。^{[2](288)}如果我们回顾一个已经熟悉的术语——符号有序化,那么空间边界可理解为构成系统性的语义边界。^{[2](288)}由于人物穿越边界(即他的移位),彼此联系的二元性元素(本质上包含代表部分或独立的世界秩序的世界与反世界)使克服障碍的主人公对这些世界与它们之间引起情节行动(穿越“语义场”)的边界的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2](291)}情节的语义性包含作为基本条件的语义化描述(包括部分或自主关联的诸多二元性元素),除空间属性外,洛特曼提及的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еселовский)、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Виктор Шкловский)与弗拉基米尔·普罗普(Владимир Пропп)对情节定义的过程也强调了情节的语义性。他指的是维谢洛夫斯基“关于主题符号作为情节主要元素”的观点,普罗普的“横组合分析”(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和什克洛夫斯基的“横组合功能研究”(синтагм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разбор),后者也注意到了修辞母题的组合。^{[2](282)}正如洛特曼

所说:“什克洛夫斯基的‘方法’是不同组合结构元素之间的关系,因此包括语义元素。”^{[2](281)}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洛特曼对文学作品情节的诠释中,主人公的拓扑移位概念侧重于语义领域中的向前运动与位移,即实际上洛特曼在情节概念中结合并说明了两个一致的原则:根据今天我们的理解,可将其称为事件情节(文学作品的情节)和语义情节(“区分”过程)。人物的性格体现了“二元对立的文本中所有条件的集合”,将性格置于差异性特征对比关系中的全部集合生成了语义聚合体。^{[2](304)}

三、作为微观、宏观与多元语境中相关性(关联性)原则的移位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只有作为多元综合的语义聚合体的组成部分才有意义的二元性元素问题?首先,因为二元性元素多元性的这种意义在符号域概念化中反复出现,比如:“符号空间的特征是其中存在具有显性组织的核心结构(通常是多个)和一个趋向边缘的更加无定形的符号世界(核心结构潜藏其中)。”^{[7](12)}这一点再次证明了洛特曼60—80年代,以及后期学术研究论著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其次,我们提出了构成语义化的多元有序形式的二元性问题,因为关联的多样性观念(作为**宏观语境**的多元综合符号空间中的语义关系)使我们回到了移位问题中**语境现象**的意义上。我们首先从**微观语境**视角探讨作为核心结构的二元性。

这是指二元性最小核心结构。这一侧重点可以解释为对结构主义一般原则的强调——这个定义是由 И.А. 皮利希科夫(И.А. Пильщиков)、Н.В. 波谢利亚金(Н.В. Поселягин)与 М.В. 特鲁宁(М.В. Трунин)在为《尤·米·洛特曼论结构主义: 1965—1970年著述》(Ю.М. Лотман 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е. Работы 1965—1970 годо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的,这三位作者评价洛特曼的《结构主义诗学讲座》(Лекции по структуральной поэтике)一书时写道:

这本书具有结构主义—索绪尔式的感召力。语言元素以及与之类似的艺术结构元素并非由其实质属性决定,而是由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这些关系决定了其相关性与对立性[洛特曼引入了一些新词:“对比对立”(со-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对比对立性”(со-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имость),这些术语也可表述为:“对比与对立”(со-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和“对立/对比”(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同上—К.К.,以及在共同系统中的功能……]⑧⑨

洛特曼强调,研究的对象不是孤立的元素,而是诸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结构整体的关系”。这使研究“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功能性”成为可能。①从移位问题与语境概念相结合的角度看,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洛特曼的定义本身,其定义与皮亚杰(Jean Piaget)对结构主义定义三个方面并不矛盾:后者提到完整性、自动调节与转化。⑨⑩我们认为,

作为语义关系核心结构的二元性、移位和语境这三个概念有如下关系:

有必要强调的是, A—B 二元核心结构形式的相关原则构成了一个最小的意义生成单位,其中各组成部分相互投射。A 的微观语境是 B 或反之。微观语境的功能可归结为投射。A 在 B 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此处,乃至所有二元关系中,以及二元关系增加时的投射都是等值范围内的语义移位。投射是意义的双向移位,因为关联性是相关元素的相互语义制约性,而二元核心结构可视为移位的微观语境。符号学中意义的产生始于语境。这种语境是系统性的标志。正如洛特曼后来所说,这种系统性是二元性、子集或亚符号域增加的基础。当他指出“在这一结构之外……这样的相对内容”^{[10](102-103)}(见:共性与差异)不会出现时,结构与功能的相互联系正是从语境的角度引起了他的兴趣。②正是为投射—移位提供条件的相对性语境保证了诗义的产生。在此还应回顾尤里·特尼亚诺夫(Юрий Тынянов)提出的“诗行的紧凑性”的观点,与特尼亚诺夫的所有遗产一样,这一观点对洛特曼产生了重大影响。③此处不仅谈到一个因诸多元素组合而产生新语境的问题,而且还对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原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对于洛特曼而言,在其 1963 年著名的一篇文章

① 同上,参见: Лотман Ю. М. 1964. С. 5-6.

② 参见: Пильщиков И. А., Поселягин Н. В., Трунин М. В. 2018. С. 16; 另见: Лотман Ю. М. 1970. С. 17, 181.

③ 另参见: Пильщиков И. А., Поселягин Н. В., Трунин М. В. 2018. С. 16.

章《论语言学和艺术学的结构概念之区别》(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го понятия структуры)中,论述的要点之一是语境的持续动态迁移,除其他原因外,这种动态迁移通过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转换得以实现。因为“只有通过对部分的理解才能领会整体,而部分只有在与整体的关系中才能被理解”。^{[11](50)}在解释部分(细节)时需要不断回到整体,这被表述为动态“螺旋”隐喻,^{[10](50)}产生这种需要的原因在于,“一个词的结构语义总是与语境、语言的意义有一定的关系”,^{[10](50)}一旦这些语境发生变化(由于一个词多次被置于不同结构语境),语境的移位就会引起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转换。将语境迁移到感知过程需要考虑到“将词语纳入复杂多样的结构中”。^{[10](49)}这种本质上持续不断的移位使一个词同时具有了多维性与单义性。艺术语言因此不再是多义性的(这会降低其信息价值),而是变得富有深意,因为由于词的多维性(可以是多语境性),“结构的每一个方面(局部结构)都赋予了词汇特有的语义内涵与单义性,由此,在这一(确切地说是整体。—K.K.)结构中,界定词汇的对立/比照越多,词汇的含义就愈发个性化,与作者意图相关的单义性也就越突出”。^{[10](49)}

洛特曼将他写于1979年的一篇英文文章以书信形式寄给了一个国外学术会议,并随后将其以英文发表在《诗学》(Poetics)杂志第八期上,文中已经阐明了文本内与文本外语境异质性和谐的涵义。

意义形成过程的发生既是文本的符

号异质性与相互不可翻译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文本与陌生语境之间复杂的意义冲突的结果……文本内部异质性与语境异质性的结合导致了语义上的‘闪烁效应’——意义在几个极端常量之间摇摆不定。^{[12](505)}(着重标记为笔者所加。—K.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二元性元素核心结构的概念,不断增加的二元性元素的语义作用是两极之间相互运动的结果。由于二元性元素的相互移位,其语义投射交替进行(A到B的移位,B到A的移位,等等)。当洛特曼谈到意义在两极常量之间的摆动时[这已经涉及到一些内容更为丰富的类型的动态联系(即移位),例如次文本(几年后,即1984年,出现了亚符号域概念)与异质的文本外语境],可以假设翻译现象所特有的,更准确地说是不对称与不可能等值翻译的现象所特有的意义生成过程中相同移位现象的作用。不同视角下的移位现象表现为一种在语境位移变化中实现的意义生成力量。正如我们所见,这既包括微观语境(二元性),也包括宏观语境(部分/局部结构语境、子集、子文本、亚符号域、外部/文本外语境等),及其增长机制中作为部分或总体语境的多元、综合的文学符号系统的创建。因此有必要以单独图解的形式呈现提供结构语义类比,从而提供符号系统性代码常量的这三个方向:

语境的移置

微观语境——二元性与不同类型的微观要素语义相关性;

宏观语境——部分/局部结构语境、子集、子文本、亚符号域、外部/文本外语境等；

语境的增值——作为部分或总体语境的多元综合文学符号系统的产生。

四、再谈约定性视角下的移位

某种类型的有序化与洛特曼所说的“反向有序化”(противо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упорядоченность)之间的关系不只是本着结构主义思维的精神,根据一个区分特征施行的一种区分原则,乍看起来,二元对立极易被归入这类关系。让我们回到情节冲突这一概念。提到这一点时,应该强调的是,在两个“思维”语义世界的交叉处与交汇处产生的张力使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主人公个性的那种特征凸显出来。这种个性,或是其萌芽在主人公的性格(情境的有序化同与之相反的主人公性格的有序化彼此交错)^①中被体现出来。洛特曼认为,性格是一种语义聚合体。不能简单地将作为聚合体的性格界定为文学人物体系中的一组区分特征,“塑造艺术形象不仅是实现某种文化图式,而且是通过局部有序化,建构极度偏离这种图式的体系”。^{[2](305)}形象中局部有序化的排列造就了语义个性(一种性格与所有其他性格的区分),这种语义个性触发了去自动化(此处洛特曼显然使用了一个源于形式主义者的术语),即期待—违反模式(схема ожидания-нарушения)。这种动态通过移位发挥作用,其方式与所有关联性投射结构中(相对性意义上的关联性框

架内)的投射相同。作为一种新意义生成的去自动化(我们可以回顾形式主义者的陌生化)引起了一种新约定性的产生。当洛特曼考虑的不再是文学人物本身,而是“极其复杂的聚合体”,^{[2](285)}比如文学作品的体裁惯例时,他也强调,有必要在彼此相关的两个系统中,对期待与违反,或对实现形式从两层和两级加以描述。

文学形象假定性意识的消失(从最小的元素到上文提到的艺术文本的体裁性质这样的主要聚合体)与对象的同构性表现增强相关。在我们看来,这种同构性的增加可以设想为一种植根于文化传统的模式得到了尽可能符合期待的实现。洛特曼认为虚构话语的作用是能够打破描述对象与相关话语之间关系的自动性。依据洛特曼与乌斯宾斯基(Б.А. Успенский)对约定性的定义,这意味着打破反映与被反映系统之间(从另一个角度看:对象与文本之间)的联系。^{[13](287-288)}主动的认知行动产生于对自动约定性的偏离、违反与打破。任何约定性都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的,而对它的违反,如果不被认为是幻想,那么就是洛特曼在文学文本各个层面上分析的那种区分行为。可以举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位学者在诠释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指出了小说内部的两条话语线:小说同时讲述了其主要人物的故事以及这部具有诸多偏离形式(在韵律、情节、诗歌语言和体裁方面)的小说是如何创作而成的。^[14]小说与元小说不能再被视为二元对立的表现——

① 参见: Лотман Ю. М. 1971. С. 283.

这两者不过是诠释的两个层面与两个阶段。为解读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这一现象,读者会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艺术作品的接受者观察小说的文学符号识别问题如何移位到元文本层面,即小说的自动自反性层面。根据这种移位,我们认识到普希金的小说与小说这一体裁众所周知的诸多体现形式之间复杂的区别。

有鉴于此,在约定性与艺术文本体裁个性最为复杂的条件下,约定性(以及各种次约定性)的更替引发了最为多元的意义的生成。

结 语

移位作为一种主要的符号学策略,用于文本内与文本间关系中最为多样化的语境移置。

这些语境包括一般二元语境与任何语义语境的相互投射,其中包括:

——母题关联现象;

——文本内结构层次的发展与分层;

——任何符号域(或亚符号域)约定性的更替;

——世界文学、文化领域艺术作品中的全球文学、文化对话与多元交流。

参考文献

- [1] Kroó K., Torop P. Text dynamics: Renewing challenges for semiotics of literature[J] // *Sign Systems Studies*. 2018. № 46 (1).
- [2] Лотман Ю.М. Структур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М].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1970.

- [3] Фаритов В.Т. Семиотика трансгрессии: Ю. М. Лотман как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 и философ [J] //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7. № 419.
- [4] Лотман Ю.М. Семиосфера. Культура и взрыв.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 Стать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Заметки[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2000.
- [5] Лотман Ю.М. Заметки о структур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J] // *Учен. зап. Тарт. гос. ун-та*. 1971. Вып. 284.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5.
- [6] Автономова Н. Открыт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Якобсон–Бахтин–Лотман–Гаспаров[М].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9.
- [7] Лотман Ю.М. О семиосфере[J] // *Учен. зап. Тарт. гос. ун-та*. 1984. Вып. 641.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17.
- [8] Пильщиков И.А., Поселягин Н.В., Трунин М.В. Проблемы генезиса и эволюции 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а в работах Ю.М. Лотмана 1960-х и начала 1970-х годов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М] // Лотман. Ю.М. Под ред. Пильщикова И.А. 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е: работы 1965-1970 годов. Таллин: ТЛУ. 2018.
- [9] Hawkes T.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1977].
- [10] Лотман Ю.М. Лекции по структуральной поэтике. Вып. 1. Введение, теория стиха. [J] // *Учен. зап. Тарт. гос. ун-та*, Вып. 160. Труды по знаковым системам 1. 1964.
- [11] Лотман Ю.М. 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ого понятия структуры

- [J] //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63. № 3. Том 5.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12] Lotman J. Trans. by M.L. O'Toole. The Future for Structural Poetics[J] // *Poetics* 8. 1979. 1970.
- [13] Лотман Ю.М., Успенский Б.А. Условность.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 //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Под ред. Ф.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а. [14] Лотман Ю.М. Пушк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ателя; Статьи и заметки, 1960-1990;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Комментарий[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1995.

The Principles of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position in Yu. M. Lotman's Literary Semiotics

Katalin Kroó

Trans. Li Ruil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transposi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meaning generation and renewal in Lotman's literary semiotics, and reveals the inherent relevance and consistency of his semiotic terminology. The author places displacement and distinction in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concepts and terms such as ordering, symbol field, and conventionality for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and explores the unique value of this issue in Lotman's study of literary semiotic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semantics, structure, and contex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ransposition, as a major semiotic strategy of meaning differentiation, participates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intra-text and inter-text symbol communic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meaning uncertainty, openness, and pluralism.

Keywords Yu. M. Lotman, literary semiotics, transposition, differentiation

(作者单位: 匈牙利罗兰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译者单位: 大连外国语学院俄语学院)